

ZHONGGUO
SHIGESHILUN
CONGSHU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张松如 / 主编

史

明清诗歌史论

周伟民 /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SHIGESHILUN
CONGSHU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张松如 / 主编

明清诗歌史论

周伟民 /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诗歌史论/周伟民著.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2006.5重印)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ISBN 7 - 5383 - 2677 - 4

I . 明… II . 周… III . 诗歌史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402 号

明清诗歌史论

周伟民 著

出版人 王 新

副主编 喻朝刚 姜念东 郭 杰

责任编辑 张兴彦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出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 (长春市同志街 199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 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大 32 开本 17 印张 字数 387 千字

版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200 册

定价 28.00 元

总序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

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思想。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

随后即开始了古典诗歌的拓展与发展时期。历秦汉而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器械一量，远迩同度”，奠定了形成汉民族的物质基础与精神素质。辞赋、乐府诗、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都相当发达。认识水平，表达能力，都显著提高，起了综合前贤、诱发后学的关键作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下，溶合黄老与屈骚而形成儒学诗教，这是中国诗歌古典主义的最早形态。降及东汉后期，兵连祸结，灾荒并臻，人民颠沛流离，正统气运已竭，由盛而衰，以至魏晋南北朝。在战乱分裂局面下，冲破一尊思想桎梏，而门阀士流清谈风起，人的觉醒，呼唤着文学的自觉，迎来了第一次诗的高潮。由慷慨多气，而庄玄禅机，言志缘情，北质南妍，渐尚华美，以至声病之学，骈骊之说，应运而生，遂为严格的诗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民族融合，新质活力，又为诗运高涨奠立始基。迨关陇健儿，金戈铁马，一统南北，所开创的隋唐五代格局，才把古典诗歌推上极峰，迎来了第二次诗

的高潮。时当中国封建社会如日中天，瞬向下晌过渡。文物昌盛，气象万千，昂扬的精神面貌，映衬出泱泱大国之风。风润雨膏，云蒸霞蔚，儒道屈禅，各呈异采，复相渗透，体现于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究，遂集承前之大成，又立启后的规范。降至两宋，风运犹存，略当午未，日暄方炽，实是自中唐而后庶族地主文士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论者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盖亦艺术趋新规律的合理体现，如合诗境与词境观之，无宁说是更胜一筹。从而迎来了第三次诗的高潮。更尤其在诗歌理论造诣上，经过程朱理学的生发，无论表现的多么曲折，在吸收了庄屈、特别是禅学之后的儒家哲学和华夏美学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从而境界、韵味、妙悟、意象诸说便日益成为诗歌美学的重要范畴和主要特色。严羽《沧浪诗话》实是唐宋而后综论诗学的标准典籍，至此已成为中国诗歌古典主义的终结。

再后则是诗歌流变的分化与深化时期，历经辽金元，而明，而清，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由诗的前进运动和基本风貌上来看，已从古典主义分化出来，并在不断深化中朝着近代目标演化。古典主义，百足之虫，虽死而不僵；但就主体言之，则适应着元明以降商业空前繁盛，城市消费日益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兴起，以大都为中心的古白话形成并成为书面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在悄然运行，直接反映在阳明心学的解体过程，并闪烁折射到艺术美学领域：“爱”、“欲”、“性”、“情”、“心”、“私”、“我”……，都被积极肯定，公然倡导，强调个人感性存在，重视男女情欲问题，明确表达了自然人性论的近代倾向，从而于诗歌上则表现为贵“本色”，崇“性情”，尚“童心”，扬“性灵”，鼓吹“自我立法”，“师心不师古”；文艺潮流五花八门，或倡言平易（公安派），或追求艰涩（竟陵派），却共同呈现出

对传统诗教的脱离与背弃；在技巧上，公然提倡“趣”、“险”、“巧”、“怪”、“浅”、“俗”、“艳”、“谑”、“骇”、“疵”、“出其不意”、“冷水浇头”等等，一反“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在形式上，体裁多样化益形显著，除传统的诗词歌赋外，更风行散曲、小令、套数、诸宫调、鼓书、弹词、山歌、小调，以至杂剧、传奇诸种诗歌与剧诗。正是在这些方面，决无夸张地说，形成为第四次诗的高潮。这就是说，在中国诗歌流变的长河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亦即从古典谐和走向近代崇高的开端。虽然这个开端仅仅成为一朵未得结出硕果的浪花。它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的保守文化政策所梗阻，正如元明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满清“雄才大略”的铁蹄所践踏一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实际上并未得从这里起步，没有能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并驾齐驱，徒令千古扼腕！乾嘉盛世百余年间，文艺与诗歌在理论认识上虽有进一步概括加深的表现，而在创作实践上则向感伤主义倾斜，一直并未绝迹的古典主义大有再度抬头的趋势。

而最后近代化以至现代化进程终于到来，这在诗歌的流变史上便是综合与融合的时期了。中国的走向近代化是外铄的，沉沉酣睡中的天朝迷梦是由帝国主义的鸦片和炮舰打破的。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近代诗歌则正是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如火如荼，日益尖锐化、表面化的情形下，配合着进步力量的斗争，首先发生了内容的变化，然后又逐渐发生了形式以至风格的变化，这是近代诗歌的主流：是服

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诗歌，或者说是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之反映的诗歌，是封建末日的预感所蕴含的理性批判精神，在发展着的现实条件下，被新的战斗烽火所点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这种形势实处于古代与近代、中国与外国各种文化观念与美学思潮激烈冲撞的交汇点上，因而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诗学与诗作，都要求着由综合到融合，以融合超综合的发展。而衡之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文学”，我们的近代诗歌实际上还未能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它并没有成为现代诗歌的开端，而仍应属于古典诗歌的结尾，没有超越前资本主义性质范畴。当然它已经为“五四”新诗歌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这也是必须估计到的。而这，却又无可置疑地显示出：未能完成社会近代化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当然更无力完成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道路，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就其总体来看，必须也只有经由新民主主义而抵于社会主义，这已是为历史实践所证实了的。它昭示我们：开始了现代化过程的“五四”以来的新诗歌，就其主流说，理应也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诗歌。当然这仅是从其社会属性而言，若论形式技巧、表现手法、审美要求、艺术取向，则必多样甚至多元。

总之，我们把“五四”以后的诗歌视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现代诗歌，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首先，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集中表现了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注，并在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加强。其次，它以改变诗歌语言为突破口，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诗的节奏韵律，实现“诗

体的大解放”，从而完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诗歌形式，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再次，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它既然是“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则自必以引进外来形式为诗体模式，不断接受外来影响并溶化在自己民族风格中，以致在语言铸造和诗艺运营上，愈来愈与外国诗歌趋同，而逐渐增加了世界性色彩。最后，它诚然完成了新传统的建立与旧传统的打破，但打破或者叫作决裂，并不意味着割断，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批判与继承，也就是推陈出新，不推陈便不能出新，而没有可推之陈，也便没有可出之新，现代诗歌总是在前代以至古代诗歌基础上，并吸收其他民族的新因素而生发创造出来的。这些便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诗歌，亦即中国现代新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的道路和特点，它迫切要求着古今中外的综合与融合，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表现手法以至创作方法，将是激励前进的主要动力。把“二为”原则真正内化在心灵里，则“双百”方针自然体现于实践中。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中两个文明建设的迅猛发展，在迎接21世纪更壮阔灿烂的日出的黎明时刻，伟大时代呼唤着伟大诗歌，空前瑰丽的第五次诗的高潮，是可以预期的。

如上所述，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我们这部《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便是依照这个框架，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是主观认识。它不是一般的诗歌史，不是一般的诗论，也不同于诗歌批评史或诗歌美学史；它是诗歌史论，属于艺术文化史性质，即诗的文化史，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或者说中国诗歌的文化之路。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套丛书？大凡写史都必须立足于今天，才能通向明天；历史只有结合现实，才得显示意义；任何文化遗产，只有根植在现实思想的土壤里，才能获得生机。历史研究，决然不得止于对旧世界的解释，而必须要指向新境地的创造。前述各种类型的有关诗歌史的研讨，都莫不皆然。而最概括最灵便的则以史论的形式为更突出。这是由于如前面已曾指出的，史是客观存在，论是主观认识，自然更方便于联系实际。有的学人反对用今语说解古籍，这是违反理解原理，不合解释学规律的，也是永远办不到的。如果不是古为今用，写史读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套丛书，合明清为一卷，总共为九卷。分看，可视为断代；合读，则成为通编。但斯编之作，在倡议时固亦曾有一个大致轮廓的设想，而各卷纲目，俱由撰写者草拟，虽经统一审核调整，究仍显示着主体意识；又都分别撰写，虽亦经过编审统稿，而仍保留着个性风格。分别看，各卷都是撰写者的专著；合来读，当可约略窥见编者的用心。总之，这是在充分发挥了个体活力基础上，由集体合力完成的一部大型著作。这样，也或者可以使它得能保持生动性与丰富性，而又不迷失方向，且遵循着共同道路，向一个目标前进。于其缘起，《中国诗歌史论》曾于1987年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经各位同志的多年共同努力，并广泛吸收前人时贤的卓识高见，现在，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并以丛书形式发表出来。这是令人欣慰的。

事属草创，意在探索。疏漏误谬，当所不免。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张松如

1992年8月于吉林大学

目 录

总序	
开篇语 文化转型时期的众声喧哗.....	1
上编 明代诗坛：花鸟猿子，纷纷荡漾	
引 言 明代诗歌发展的轨迹.....	3
第一章 吴越文化的讴歌	37
第一节 平民帝王的歌唱.....	38
第二节 易代诗人王冕与杨维桢	47
第三节 明初诗人群体的特征	59
第四节 刘基：明初新诗风的振起	67
第五节 诗坛巨擘高启	73
第二章 盛明诗坛的回响	89
第一节 雍容和易的台阁体	90
第二节 流派蜂起，别开生面	97
第三节 才气放逸的解缙	101
第四节 社会转型期诗歌理念与诗歌创作近代化的先声 ——丘濬	105
第五节 民族英雄于谦的诗	119
第三章 发酵的诗坛在涌动——中明复古与反复古的 对立与互补.....	128
第一节 绍先启后的过渡诗派——茶陵诗人的历史地位	130
第二节 复古与变古的互动——前七子求真的艺术追求	139
第三节 唐宋派的“统于同”及“珍其独”	152

第四节	前呼后拥的复古思潮——随时代思潮起伏而变易的 后七子	165
第五节	从复古到浪漫——江南四才子对社会既有规范和 界限的“离异”	182
第六节	时代催生出两位富有人情味的怪杰——徐渭、杨慎	207
第七节	中明的“心学”之歌	227
第四章	晚明诗歌的漫唱与革新	236
第一节	晚明革新运动的前驱人物——李贽与焦竑	237
第二节	意气慷慨的汤显祖	249
第三节	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袁宏道与公安派	265
第四节	深幽孤峭的竟陵派	286
第五章	末代悲歌	295
第一节	高风亮节的张岱	296
第二节	慷慨沉郁的爱国诗人陈子龙	304
第三节	末代诗坛一颗耀眼的彗星——夏完淳	310
第四节	抒写万古愁思的归庄	316
第六章	明代民歌与散曲	325
第一节	明代民歌的勃兴	325
第二节	冯梦龙与明代民歌	328
第三节	明代民歌的内容及艺术技巧	330
第四节	明代散曲	334
下编 清代诗坛：花团锦簇，热闹异常		
引言	鸦片战争以前清诗发展的轮廓	344
第一章	学者型诗人作盟主的清初诗歌	349
第一节	清诗的开山鼻祖顾炎武	350
第二节	记录明末遗民心路历程的黄宗羲、王夫之	357
第三节	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	374

第二章 康熙朝的盛世诗坛	389
第一节 南施北宋的盛世之音	
——施闰章与宋琬	389
第二节 南朱北王的治世之音	
——朱彝尊与王士禛	399
第三节 宗唐与宗宋的诗派分流	
——赵执信与查慎行	417
第三章 乾嘉诗坛的流派纷争	430
第一节 江南名士的悲剧	430
第二节 “颇树一帜新”	
——乾隆三大家之一——袁枚	437
第三节 乾嘉考据学的诗化	
——翁方纲的诗论及诗作	447
第四节 “江山代有才人出”	
——乾隆三大家中的赵翼和蒋士铨	452
第五节 浙派诗坛领袖厉鹗	462
第四章 盛世哀音的吟唱	467
第一节 扬州怪杰郑燮	467
第二节 慷慨悲歌的黄景仁	474
第三节 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张问陶	480
第四节 纪昀的诗	487
第五章 桐城之歌	496
第一节 “意气横绝陵九州”的刘大櫆	497
第二节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	502
第六章 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的词坛	511
第一节 沿明末余习的“云间词派”	512
第二节 以词代经史的阳羡词派	515
第三节 浙西词派的唯美词风	518
第四节 满族著名词人纳兰性德	523

第五节 重在寄托的常州词派	526
结束语.....	530

开篇语 文化转型时期的众声喧哗

对中国明清两朝的研究，近年来有一种世界化的趋势。海内外学人把明清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热点，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

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状况特别复杂；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许多文化现象饶有兴趣，特别容易引发研究者产生不同的认识，引起不同的争论。

历史转型时期，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变古乱常”。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中长期维系着的农业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单元化被逐渐强化了的商品意识所取代，从而构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多元化；这样一来，在文化上呼唤着各个领域的全面更新；特别是由于传教士带来了“西学”，打破了中国社会原先的垂直封闭的发展，开始了横向开拓，文化的外求意识日渐强烈，“西学东渐”与“东学西被”所激发起的碰撞，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传统的古已有之的各种规范，受到了挑战，变古乱常在各个领域渐次出现。诗歌领域也不例外。

当时的诗人和诗论家当中，极少数极少数人能看到诗歌变革全局的高低纵深，大多数人只能随着大流，依顺着内外压力，一步一步地，逐渐意识到诗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前后左右地探索着。探索的结果，反映在历史上，形成了极为纷繁复杂

的文学现象。诸如，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交替、中外融和的文化漩涡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诸多诗歌流派与思潮；诗歌的种类与体裁丰富多采；诗人捕捉到正在变革中、正在走向近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并形之笔端，构成诗的新的内容；诗的语言、结构、风格和艺术技巧的实质性的变化；新的诗歌观念的诞生以及诗与社会文化的复杂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文化转型期诗坛上的众声喧哗的局面。

众声喧哗，是对一个历史时期中大体运行状况的一种粗略判断；其中当然也有过一些时候，诗人们噤若寒蝉。即使是在这样的短暂的历史回旋的时期，诗坛的空间即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陌生天空，这一陌生天空，很可能导致后来更大的无序化和杂乱无章，也给民歌与散曲带来更加强烈的反核心化的倾向。这种疏远典雅和华贵的创作倾向，必然会带来政治与文学上的全局性的失控与松动。

文化转型期的诗歌形态，诗坛状况非常复杂，诸多现象并存杂陈成了常规。这样，面对的一个动态的文学流程，我们如果仍然用一种非常固执的圣贤美学与伦理原则去规范它，当然会是格格不入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说：“新理论的同化作用要求重新构思原来的理论，重新评价原来的事。”承受和容纳新的理论，以开放的、融合的观念来重新审视原先的结论：明清时代的诗的运动与争论，是徒劳的，明清无好诗！我们想重新为明清的诗歌流派、大师及经典定位，寻找这众声喧哗当中主题、风格、技巧杂陈分歧的深刻的历史意义，逆揣诗人、诗论家们始料未及的创作动机及理论动机，见出他们在艺术与理论上的贡献及失足所在。当然，对明清两代这许多诗人作品的价置，秩序的调整，也仅仅是明清诗史获得当代性的一种表现而已。

上编 明代诗坛：花鸟猿子，纷纷荡漾

引言 明代诗歌发展的轨迹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诗歌园圃中，唐诗以前，是被耕耘得最为细密的土地；于是，唐以前的诗，论者的评价也极高，宋诗退而求其次，明清不论矣！概括性的意见，是现代学者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诗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的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无非重新证实一遍挣扎的徒劳与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功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已唱完了。”（《闻一多全集》（甲集））这是一家之言。我们认为：“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意义是很大的，价值也是很高的。第一，明清社会是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文化变革过程。明代中叶以后，中西文化碰撞开始，其强度越来越大。明代诗人倡导那许多诗的运动、流派，引发许多争论，可以看作是中国诗歌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中西文化交汇后的一个环节，其中所贡献出来的思想材料，是诗史

向前演变的重要的依据；五四运动之前，鲁迅提出“求新声于异邦”的命题，他的思想承传，可以追溯到明诗。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蓬勃展开，明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明诗，特别是晚明诗、民歌及散曲，可以看作是广义的中国前现代诗，带有先锋性质的探索。第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到了明代，由于商业、商品经济萌芽这个社会的大楔子，逐渐嵌入社会的大框架中，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大松动，进而使封建社会的结构几乎散架。后期封建社会的心态的复杂性，在小说，戏曲中固然有反映，明代的诗歌，在记录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历史状态特别是封建士大夫的心态，就整体上说来，是逼真的，凝炼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史的过程，这份遗产是极其珍贵的，值得我们珍视的。第三，至于明诗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反映，对于研究明史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明诗数量极大，量中求质，有些诗人有些诗作，品质是很高的；诗作中形成的诸多风格，诸如或激越豪放的诗格，或沉雄朴拙的诗风，或幽淡纯雅的诗调，对于今天诗歌创作如何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提高诗歌的艺术水平，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明代胡应麟发表过他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

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典午创变，至于梁、陈极矣，唐人出而声律大宏。大历积衰，至于元、宋极矣，明风启而制作大备。

（《诗薮续编》卷一）

这一代“明风”的形成，对于过去的时代来说，反映了对唐音宋调的继承和革新，对于当时明代的社会特性来说，是时代思潮对于明诗的影响和制约，对于后来的清代诗歌，又启变革的